

# 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以改革开放初期为考察<sup>\*</sup>

何伟

[关键词] 传统文化；哲学渊源；改革开放；中国外交；话语体系

[摘要] 文化与外交关系密切。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外交思想和行为的哲学渊源。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思想及其话语体系构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影响了当时中国的道路观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处世观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交往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回溯历史，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之间的逻辑关联，有助于新时代中国充分发掘和转化传统文化资源，完善自身外交话语体系，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外交新理念和新实践，推动世界话语的多元发展。

[作者简介] 何伟，外交学院英语系讲师（北京 100037）。

在外交领域，文化传统为外交提供了特定的知识背景，影响一国建构的外交话语及其实践，而相关的外交话语也体现了其文化特性和时代特征。文化在无形中影响着一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哲学，从而影响到一国与国际体系互动时所选择的道路观、处世观和交往观。中国外交思想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因深受其熏陶而独具特色。<sup>①</sup>冯惠云指出，儒家文化给中国外交思想和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要素。<sup>②</sup>费孝通认为，几千年积聚下来的东西，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还会发生作用，中国文化里边有很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和难题，比如“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实践。<sup>③</sup>此外，文化对一国对外政策也具有引导和规范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处的整体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和重大的变化，给当时中国外交带来严峻的挑战。然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也取得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成就。这一切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项目编号：16ZZD029）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笔者得到外交学院孙吉胜教授，以及期刊编辑和匿名评审人富有建设性的评论和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① 王易、黄刚：《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思想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Feng Huiy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Routledge, 2007, p. 19.

③ 费孝通、李亦园：《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和借鉴。可以说,传统文化既为当时中国外交思想提供了哲学根基,也引导了中国的外交话语及其实践。

虽然外交是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sup>①</sup>却鲜有对该时期中国外交话语及其体系建构的系统表述和研究。<sup>②</sup>本文从传统文化入手,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时的道路观、处世观和交往观,试图诠释出传统文化因素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和逻辑关联。考察此阶段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关系可为构建当今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提供历史参考,更好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可以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深厚的哲学渊源和地方知识,推动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融通与互动,从而推动世界话语体系的多元发展。

## 一、道路观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话语

国家的道路观决定了一国与外界互动和交往的模式。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民族价值观念和民族智慧的选择和运用。<sup>③</sup>在对外关系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话语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 (一) 自强不息与真正的“不结盟”

自强不息是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的基本精神。《周易·乾卦》记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指一种自主自尊、力图革新和锲而不舍的文化传统。在个人价值层面,指个体为实现自我价值,勇于进取,持之以恒。在社会价值层面,自强不息要求当权者要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勤勤勉勉,锐意进取,要追求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国家层面,自强不息要求一国在国际场合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对外交往上求真务实,不弄虚谈,追求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在深化毛泽东时期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基础上,中国政府提出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话语,进一步将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强调本国独立自主的同时,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同时积极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推动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中国表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sup>④</sup>

在强调自强不息的同时,孔子指出“为仁由己”,孟子强调“万物皆备于我矣”。这表明,一个人要使自己成为有知识、有道德、有功业的人,必须按照自己确立的目标,把自己的言行纳入正确的轨道,并以此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修持自己。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一以贯之”,“遵道而行”,不可“自暴自弃”,“半途而废”。<sup>⑤</sup>体现在国家层面上,这要求一国在选择对外道路时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坚持大的战略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在很多重要场合,中国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确保国家具备切实发展的能力,主张“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sup>⑥</sup>并坚持“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

① 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② Roland C. Keith,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Routledge, 2018, p. x.

③ 王让新:《“崇和尚中”:邓小平内政外交思想中的中国智慧》,《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5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⑤ 姜国注:《儒家的自强不息论》,《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09页。

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sup>①</sup>

## （二）崇尚和平与反对霸权

崇尚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标志，是中华精神的美德，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一贯追求。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发起了“发仁政以王天下”的政治主张，号召统治者加强“仁爱”、“怀德”的修养，“以德平治天下”。在老子看来，“兵者不详之器”（《老子·三十一章》）。孟子认为，“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与西方扩张型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敛型文化。<sup>②</sup>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遵从王道，反对霸道，即便是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主张“文战”“柔武”，以和平非流血的方式，实现“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和“无以战胜人”。崇尚和平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提供了一条主线。反对霸权、争取和平一直是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宗旨，也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话语的具体表现。中国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实施，坚信“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sup>③</sup>

一方面，进入改革开放初期，反对霸权主义不再是固定地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从事实出发，不以社会制度划分界限，反对在国际领域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践踏他国主权、破坏国际制度和规则的一切政策和行为，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sup>④</sup> 另一方面，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坚持自己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实行永远不称霸的长期外交战略政策。中国不仅愿意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边，更积极加强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对话，努力改变对第三世界广大国家不利的国际秩序。面对当时西方国家鼓吹和散播“中国威胁”的话语，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发展强大后所抱有的疑虑和猜忌，中国反复强调反对霸权的对外话语，表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sup>⑤</sup>

## （三）变易哲学、民富思想与对外开放的对外话语

变易哲学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思维方式和精神动力，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对外话语实践。《易经》的主导思想是“变”，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礼记·大学》记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强调了变革和更新对于事物发展和前进的重要性。面对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的局面，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sup>⑥</sup> 并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sup>⑦</sup> 实行对外开放，首先要解放思想，辩证地看待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西方先进国家间的关系，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中国政府意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sup>⑧</sup> 中国对外开放，加入世界经济的大潮，可以利用“后发展优势”，借鉴先进国家的新技术，引入大量国外资本，甚至能利用劳动力价格低廉和优惠的投资政策等优势，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民富思想和人本主义也深深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话语体系。富国必先富民、利国必先利民的思想很早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博士广济”是人道主义的文化内涵。《论语》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荀子》言，“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这些“安民”和“富民”的思想要求统治者要为民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鼓励人民积极生产，才能实现民富国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

①④⑤⑥⑦⑧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128、363、370、237、78页。

② 张文科、刘晓洁：《邓小平不称霸思想多视角解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7页。

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外交是中国构建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外交最根本的落脚点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一个有利的国外环境,一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经济;二是以中国的经济力量为依托,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这些思考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和民富思想。

## 二、处世观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话语

与人际交往类似,国家与国家交往也需要特定的处世观作为指导。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冷静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基础上,中国政府高瞻远瞩,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话语。韬光养晦反映了中国人在与外界交往和自我定位时的一种价值取向,意在告诫人们,要善于掩藏自己的锋芒和优势,善于守拙,不显示能力,不与人争,不与人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话语为中国定位自己的国际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不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后来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道德经》里,老子的“贵柔尚弱”思想为韬光养晦提供了精神实质。在此,韬光养晦是一种自我身心修养的技术法门,引申到社会管理和国际外交上,它具有方略的意义。<sup>①</sup>此外,儒家文化里的“中庸之道”“修身以敬”等交往之道是调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思维方式,也影响到韬光养晦话语下的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和埋头苦干、有所作为等外交话语的提出及其实践。

### (一) 贵柔尚弱与稳住阵脚、冷静观察、沉着应付

在《道德经》里,老子提倡一种“柔弱”“不争”的退让方式与人相处,如同水一样,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然而,“柔弱”不是“软弱”或“懦弱”,“慈让不争”也不是消极退让。“贵柔尚弱”背后是一种基于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而提出来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老子指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即不争的实质是大争,柔弱的目的是刚强。老子建议国家之间尽可能地避免各种与刚强相关的事,如争强好胜,争名夺利。国家之间只有不争不斗,世界才能和平。<sup>②</sup>韬光养晦的含义是隐匿光彩、收敛锋芒,比喻隐藏才能不外露,待时而发。这与老子的“柔之胜刚”“弱之胜强”的主张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在这里,“弱”成为一种以退为进、韬光养晦的策略,表现为沉着冷静、养精蓄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冷静分析了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后,党中央制定了新的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邓小平强调,“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sup>③</sup>此外,他还告诫全党同志,要“稳坐钓鱼船,沉着应付,蛮不在乎,力争不断发展。”<sup>④</sup>国际斗争纷繁复杂,韬光养晦下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做法可以避免中国树敌过多而不堪重负,也同时为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竞争争取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国内的现代化建设。

### (二) 中庸之道与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中庸概念由孔子提出。《礼记·中庸》有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字面意思来看,“中”指中正,中和,不偏不倚;“庸”指平

① 詹石窗:《韬光养晦:〈道德经〉第七章解读》,《老子学刊》2017年第2期。

② 张志芳:《论〈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

④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常、常道。合在一起，表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两不相误。《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也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在于警惕过犹不及，主张和谐适度，反对极端。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智慧体现在韬光养晦中的“绝不当头”战略中。中庸思想强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道，违背此道，“过”或者“不及”，都将失去“天下之大本”，偏离“天下之达道”。“不当头”要求中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虑，在国际事务中不当头。

鉴于当时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国旨在珍惜和抓住相对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守住自己的锋芒，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国际纷争之中。在汲取苏联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坚持“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sup>①</sup> 在如何处理和与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sup>②</sup>

### （三）修己以敬与埋头苦干、有所作为

修己以敬是儒家对于君子的要求。在先秦儒家看来，修己以敬是将“和为贵”的政治伦理追求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的要求。<sup>③</sup> 修身不仅只是关注自身的完善，还要达到“修身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的目的。在个人层次，修己是提高自己个人修养，这既是对自己的尊重，也能赢得别人的敬重。这也直接关系到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因为修己的最终指向是朝外，是敬人和安人，达到和谐关系的目的。体现在国际关系上，一国自身的发展理念和民族修养往往决定一国对外发展的性质和目的。修己以敬要求中国要埋头苦干，有所作为，这也符合韬光养晦的实质，因为韬光养晦的精神内涵是冷静、谨慎，长期埋头苦干，集中精力干中国自己的事情。<sup>④</sup> 韬光养晦要求在同外界交往时表现为一种不露锋芒和隐藏才能的手段，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有所作为，即追求国家利益的发展。

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在探讨中国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sup>⑤</sup> 他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有所作为。”<sup>⑥</sup> 韬光养晦有利于当时中国不受或少受外界干扰，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有所作为则体现了中国脚踏实地的务实和实干精神。<sup>⑦</sup> 此外，修己以敬也要求一国也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发展，忽略或是侵犯他人的利益，而是要有助于促进世界关系的和谐发展。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话语指导下，中国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和打压，与更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稳定了周边的国际环境，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sup>⑧</sup>

## 三、交往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话语

中国传统文化在重视个人“仁”“爱”“礼”等方面修养的同时，也广泛深入地将这些伦理原则应

①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

③ 赵凯：《同人心，贵人和：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心理学思想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④ 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6页。

⑦ 杨杨：《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及其发展》，《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⑧ 门洪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外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7期。

用在社会、政治和国家间的关系上。“亲仁善邻”“大一统”“求同存异”的思想均影响到改革开放初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话语及其具体实践。改革开放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内涵,使其进一步成为指导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在国际政治领域拥有较为广泛的话语权。<sup>①</sup>在坚持用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同时,中国还提出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设想。在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开展睦邻友好政策,提出和实践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也积极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 (一) 亲仁善邻与睦邻友好的周边政策

亲仁善邻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为贵”“仁爱”和“礼制”的具体表现。《左传·隐公六年》记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孟子主张“交邻国之道”。管仲指出,“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管仲·霸言》)。此外,诸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典故都表明,一国与其近邻有着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的联系。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才能既有利于一国自身发展,也能促进邻国发展,形成共荣发展的和平局面。在改革开放初期,亲仁善邻的思想影响了我国睦邻友好的外交话语及其实践,使中国在建立国际间正常关系的问题上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中国政府坚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sup>②</sup>在亲仁善邻的睦邻友好政策话语的指导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原则来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秉承睦邻友好、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策,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89年,中国与老挝关系实现正常化。1990年,中国与蒙古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两国中断达23年的外交关系。同年10月3日,中国与新加坡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领导人也实现互访。中印两国于1993年10月正式签署《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在东北亚区域,中韩两国于1992年8月24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为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条件。<sup>③</sup>

在改革开放之初,亲仁善邻中的追求和谐、兼容并包、协和万邦、和谐共处的原则也体现在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话语中。搁置外交指将一时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或引起激烈冲突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去解决,或是让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解决。<sup>④</sup>搁置争议的原则可追溯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中庸之道”等思想。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坚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家争端,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sup>⑤</sup>在睦邻友好政策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话语和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妥善处理与邻国存在的一些领土争议,巩固了与邻国的关系,为中国国内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比如,中苏于1991年5月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并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邓小平1984年提出共同开发的思想。在南沙群岛争端上,中国表示

① 孙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话语分析:兼论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认知》,《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0期。

②⑤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49页。

③ 颜声毅:《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概论》,长征出版社,2002年,第313页。

④ 曹玮:《搁置外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外交理念新探索》,《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期。

愿意相关国家搁置南海相关岛屿的争议，推动交流与合作。

### （二）大一统、和合思想与“一国两制”的实践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既是文化观念，也是一种民族心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凝聚力，统一和兼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各民族杂居融合，带来文化和思想上的结合。历代以来，反对分裂，主张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孔子的“大一统”主张，孟子的“定于一”思想，荀子的“天下为一”观念，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呼求均体现出中华民族浓厚的爱国主义传统。一般来说，需要统一的对象之间有着很大差异和不同，而如何协调事物间的差异、使之呈现和谐融洽的共存局面是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的难点所在。在此，“和合思想”则提供了问题的解决之道。和合文化在追求外部事物之间和谐与和而不同的同时，也追求内部的和谐与统一。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崇尚民族融合，团结统一的民族心理。

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直接影响到我国在祖国统一大业上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解决方案。“一国两制”是一种有利于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思想。<sup>①</sup> 费孝通指出，“一国两制”不光是处理国家统一上的政治创新，“再一步去看它的本源，有一个中国文化的本质在里边，它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没有这样一个本质，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也不会出来‘一国两制’”。<sup>②</sup> 由于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可以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从民族最大利益出发，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大业。1984年，邓小平表示，“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sup>③</sup> 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与大陆实现统一。有学者评价说，“一国两制”构想坚持了大陆社会主义的主体作用，也包容了港澳台的不同特点，一是尊重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二是照顾当地人民的希望和利益，三是考虑国际，尤其是英、葡、美等国与当地的关系。<sup>④</sup> 这便充分体现了以“和合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

### （三）和而不同与国际新秩序

和而不同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出“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思想，指的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礼记·中庸》记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以他平谓之和”。和而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处理国际关系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sup>⑤</sup> 和而不同的思维也主张在差异中互动、学习和交流，从而达到化解矛盾，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对事物状态和发展模式的理解和追求，尊重不同事物的独立和独特性，主张不同事物应该在多元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共处和共赢。和合思想也要求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遵循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样才能和睦有着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的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朝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方向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了我国提出的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话语和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出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认为世界正

①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② 费孝通、李亦园：《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④ 程鹏飞、杜怀亮：《“大一统”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和平统一》，《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⑤ 王易、黄刚：《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思想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在出现多极化的趋势，而中国是其中的重要一极。这些趋势呼吁改革旧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如此，各国人民可以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决定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间也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此外，国家也可以不分贫富、大小和强弱都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通过求同存异、平等友好的方式来解决国际分歧和问题。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80年代又多次在重大外交场合强调其重要性。在中国政府看来，我国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sup>①</sup>此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和属性，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sup>②</sup>1990年12月24日，中国政府表示，“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sup>③</sup>

## 结 语

传统文化为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辨和地方知识来源。在改革开放之初，诸如“自强不息”“中庸之道”“和为贵”“和而不同”“大一统”“亲仁善邻”等传统文化思想均影响到当时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史为鉴，在改革开放初期，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之间的关联和内在逻辑验证了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辩证性吸收和借鉴。在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悠远的文化传统给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营养，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结合中国实际改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创造自己的研究话语，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设。<sup>④</sup>过去十年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起初主要讨论如何创建中国学派，后来逐渐出现一些具体的本体化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这些理论正是在探索地方文化知识和实践的基础上构建的。<sup>⑤</sup>

在外交实践上，传统文化依旧影响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且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呈现出继承和发展的特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多具备了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中国对文化的重视已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层面；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构建和完善外交话语体系的任务。<sup>⑥</sup>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提供思想渊源的传统文化也为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外交新理念提供了哲学根基，成为影响国家政策和对外行为的直接途径。比如，在明确自己世界大国定位时，中国政府明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此外外交新理念的核心在于“共同命运”和“合作共赢”，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精髓的最新发展。<sup>⑦</sup>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

①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363页。

② 卫灵、孙洁琬：《邓小平外交思想探究》，法律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9页。

④ 陈岳、李永成：《国际关系学：进展与问题》，《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2期。

⑤ Qin Yaqing, “Recent Developments towards a Chinese School of IR Theory”, April 26, 2016, <http://www.e-ir.info/2016/04/26/recent-developments-toward-a-chinese-school-of-ir-theory/>.

⑥ 孙吉胜：《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

⑦ 金灿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当代世界》2017年第10期。

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sup>①</sup>可见，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观也传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中“和合”“仁爱”和“礼制”等思想。此外，面对外界对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新的外交理念的质疑，传统文化的视角可以更好地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背后的文化故事和民族特色，更好地推动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融通与互动。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提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sup>②</sup>因此，如何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转化为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软实力，在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同时，讲好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背后的文化故事，推动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更好地融入和引领世界话语体系，可以成为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The Case of Early Stag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He Wei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ese diplomacy; discourse system

[Abstract] Culture relates closely to diplomac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erves a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Chinese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actions. China's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re influenced deeply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the chosen way and the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the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outside and the policy of Taoguangyanghui and Yousuozuowei (avoid limelight, never take the lead, and accomplish something), the way of exchanges an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Discussing the logical linkage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initial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an help us to further tap the rich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etter our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 a better narrative of China's new diplomatic concepts and practices, and promote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discourse in the New Era.

[责任编辑 刘蔚然]

<sup>①</sup>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http://www.gov.cn/xinwen/2015-10/13/content\\_2946293.htm](http://www.gov.cn/xinwen/2015-10/13/content_2946293.htm).

<sup>②</sup>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8-12/18/content\\_5350078.htm](http://www.gov.cn/xinwen/2018-12/18/content_5350078.htm).